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在通向正确生活的途中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罗松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与文化》丛书 || 江怡 主编

在通向正确生活的途中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罗松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通向正确生活的途中：阿多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 罗松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203-0966-0

I. ①在… II. ①罗… III. ①阿多诺 (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1903-1969) —伦理学—研究 IV. ①B516.59②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01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

江 怡

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文化的复兴被看做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在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创新自己的观念，在时代文化的多样变化中构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挑战。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回应重要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充分的知识准备，更需要我们的思想智慧。

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自觉的结果将改变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知道，这里的文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体

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

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涵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更多的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中的人和事，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各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更重视整体和全局，而不是个体和局部。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智慧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个人认识活动是以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经验归纳的特征；而经验活动本身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体和全局，所以，中国人的思维又具有抽象普遍的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出自我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对前人长期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表达的提炼升华。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我们理解了不同于我们思维方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是我们通过不同哲学之间比较的结果。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自身哲学的重新认识，甚至是对自身哲学思维方式的重新定位，激发了我们全面理解自身哲学

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我们开始形成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

首先，哲学的自觉意味着我们对思想的主动认识。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由此看来，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① 思想正是在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哲学由此产生。因此，哲学的自觉本身就意味着思想。这里的思想并非完全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活动，或者是对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理解，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我们认识活动内容的抽象概括，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化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就要求思想以概念的方式形成对我们所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们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在于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②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页。

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 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理论能够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

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② 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对以往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思想的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是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是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用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

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概念的层次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

本套丛书冠名《哲学与文化》，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因为文

化是哲学的外在体现，而哲学则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我们将在本丛书中陆续出版国内具有影响的哲学学者以及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著作，充分反映国内学者们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独特思考。

本丛书得到国家“985工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大力资助，特此感谢！

前 言

20 世纪德国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西奥多·W. 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 本书中统一译为“阿多诺”) 对道德问题的思考深入而持久。在结束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之后^①, 阿多诺于 1951 年出版《最低限度的道德: 从被损害生活而来的反思》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n beschädigten Leben/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以下简称《最低限度的道德》), 这是他重返祖国后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如果说阿多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道德问题的思考略显沉寂, 那么在整个 60 年代, 道德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则成为其理论关注的焦点, 而贯穿其道德反思的一个主题即是: 在错误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生活 (Es gibt kein richtiges Leben im falschen. / Wrong life

^① 关于阿多诺的思想导论性传记, 可以参看 [美] 马丁·杰:《阿多诺》, 瞿铁鹏、张赛美译, 张晓明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日] 细田和之:《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 谢海静、李浩原译, 卞崇道校,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德] 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尔:《阿多诺》, 鲁路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威尔逊 (R. Wilson) 的《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2007), 该书中文译本已出版; [英] 罗斯·威尔逊:《导读阿多诺》, 路程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奥康纳 (B. O'Connor) 的《阿多诺》 (*Adorno*, 2013)。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变迁及理论演变, 可以参考 [美]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 单世联译, 陈立胜校,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孟登迎、赵文、刘凯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瑞士] 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 评判理论与政治》, 郭力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cannot be lived rightly)。^①

众所周知,以哈贝马斯(J. Habermas, 1929—)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对其前辈学人多有批评,他们认为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M. Horkheimer, 1895—1973)、马尔库塞(H. Marcuse, 1898—1979)等第一代学者的批判理论因过于激进且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基础或有效性前提而失于悲观、消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里程碑式著作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清楚表明,有赖于理性的启蒙运动却因理性自身而事与愿违、“自我毁灭”,“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更不用说具体历史形态以及与该概念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制度,已然包含着今天随处发生的倒退的萌芽”。^②在哈贝马斯等人看来,这种进退失据而又看不到出路的疑难(*aporia/aporia*)问题始终困扰着该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并削弱了社会理论(或者说社会哲学)的批判力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激化和公开不断自我超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矛盾,而根本没有想从理论上克服这一矛盾”,“沉湎于对理性的任意怀疑之中,而没有去思考怀疑自身的理由”;^③又或者他们两人“不能进一步解释,作为一项历史性的规划,理性对自身的超越(启蒙对自身的启蒙)应该

① T.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n beschädigten Leb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12, S. 43; T.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translated by E. F. N. 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 39. 这一节的完整译文见本书附录一。在1963年的“道德哲学讲座”中,阿多诺反复提到了这一主题。[德]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谢地坤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4页。

②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12, S. 3; Max 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Gunzelin Schmid Noerr,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xvi.

③ 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50页。

是怎样的”。^①

然而，是否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或启蒙理性的批判仅仅止步于摧毁一切？是否为阿多诺所坚持的非同一性（nichtidentität/ non-identity）哲学最终只能在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产生的审美体验中展现社会批判理论的解放旨趣？作为哈贝马斯的弟子、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人的代表，霍耐特（A. Honneth, 1949—）在《权力的批判》一书中指出，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洛文塔尔、本雅明、马尔库塞几人都约而同地将艺术作品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关键主题”，在审美体验中，“感官印象如同在对自然的审美感知中一样不再受到工具性的观念模式的过滤；另一方面，社会解放也同时以一种摆脱统治的对自然世界的占有为前提”，因而，“艺术作品就仍然能够独自完全代表那种对社会自由的规范性的要求”。^② 不过，在笔者看来，阿多诺对“正确生活”（richtiges Leben/ right life）的思考可以说是对上述批评的一种有力回应。

事实上，自2001年伯恩施坦（J. M. Bernstein）的《阿多诺：祛魅与伦理学》（Adorno: Disenchantment and Ethics）^③ 问世以来，阿多诺的道德哲学乃至实践哲学在西方学界已经日益成为一个热点

① 参见[德]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3页。实际上，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虽然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等试图努力克服阿多诺等第一代学者批判理论的理论困境，但依然保留了明显的延续性，最为突出的便是对社会的弊端和不公保持敏感。参见斯蒂芬·缪勒-杜姆：“如何批判？社会批判理论诸路向的合与分”，载于[英]吉拉德·德朗蒂编：《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② 参见[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权力的批判——社会批判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童建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4页。

③ J. M. Bernstein, *Adorno: Disenchantment and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问题。^①目前,国内学界也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2013年11月2—3日,在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主办的“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马克思主义——纪念阿多尔诺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办方专门安排了一场关于“阿多诺的道德与生命学说”的分会讨论,笔者有幸与会并做了题为“生命的辩证法——基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思考”的学术报告。^②也正是在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一兵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坚持其十余年前的观点,指出“阿多诺的哲学思想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深度上所能达及的最高点”,同时也“宣告了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终结”。^③笔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一观点,不过,阿多诺的道德哲学思想或许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这种批判理论自身蕴含的逻辑困境。

为此,全书将以阿多诺对“正确生活”的思考为核心,集中探讨其道德哲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笔者在导论中将从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能够被允许继续生活”这一追问入手,阐明阿多诺道德哲学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史语境;接下来在正文的开

① 近年来,仅英语学界就涌现出许多与此相关的原创性学术著作,如赫尔菲尔德(C. Hearfield)的《阿多诺与自由的现代气质》(*Adorno and the Modern Ethos of Freedom*, 2004),盖耶斯(R. Geuss)的《伦理学之外》(*Outside Ethics*, 2005),哈默(E. Hammer)的《阿多诺与政治》(*Adorno and the Political*, 2007),摩根(A. Morgan)的《阿多诺的生命概念》(*Adorno's Concept of Life*, 2007),博威(A. Bowie)的《阿多诺与哲学的终结》(*Adorno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 2013)以及弗瑞耶哈根(F. Freyenhagen)的《阿多诺的实践哲学》(*Adorno's Practical Philosophy*, 2013)等。

② 参见拙文:《生命的辩证法——基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5期,第117—123页。该文是在这次学术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③ 张一兵:《阿多诺:永远的思想星丛——纪念阿多尔诺诞辰110周年》,载于何萍、吴斯炜主编:《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马克思主义——纪念阿多尔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的“绪论”这样写道:“以40年代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为标志,法兰克福学派把‘理性’这个西方文明的根基作为批判对象时,事实上已经开创了一条全新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思路,因此1966年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出版同样预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人本主义逻辑的自我解构。”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篇，笔者将主要围绕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反思以及自由时间的思考，阐发其对“错误生活”不同面向的揭批（第一章）；随后，在分析阿多诺对海德格尔“向死而在”思想进行的激烈批评中，阐发阿多诺提出的一种属于现时代（奥斯维辛之后）的“生命律令”（第二章）；接下来，笔者将在思考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上，探讨基于个体生命及其特殊经验与普遍道德法则之间非同一性关系的“正确生活”何以可能问题（第三章）；在此基础上，结合阿多诺对康德与萨特自由观的批评，进一步反思其道德哲学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即“否定的自由观”（第四章），并在思想史的语境中探讨马克思的自由学说及其与阿多诺自由观的相通之处；最后，在第五章中，笔者将结合阿多诺对思想的道德与任务的理解，分析非同一性道德哲学视域中通向正确生活的两条路径，即不妥协的反思与批判和意在提升政治成熟的教育。

此外，本书附录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由笔者根据德文版并参照英译本译成的阿多诺著作篇章。一是选自《最低限度的道德：从被损害生活而来的反思》中的几节断片，笔者将在本书中着重分析其中的关键段落；另一篇是阿多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作的一篇广播讲稿“自由时间”（Freizeit），这篇广播讲稿也与本书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我们将在第一章借助这篇讲稿集中考察阿多诺对错误生活、特别是虚假自由的反思。第二部分是笔者较早撰写并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大概写于 2010 年前后），一篇是“虚假文化与本真艺术——试论阿多诺的文化哲学”，在笔者看来，阿多诺的文化哲学与其道德哲学内在相通，因此附在本书之后；另一篇是探讨康德人学思想的论文“德性何为——试论康德的人学思想”，阿多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对话中阐发其相关思想的，我们将在本书第三、四章中着重讨论这一点，为此也将这篇文章附上，笔者希望，这两组附录能够和正文内容一道，形成一种为阿多诺所推崇的彼此相属同时保持各自差异的“星丛”式整体。

目 录

前 言	(1)
导论 奥斯维辛之后的追问	(1)
第一章 错误生活的迷途	(18)
第二章 现时代的生命律令	(41)
第三章 个体生命与道德法则的非同一性	(71)
第四章 自由的辩证法	(104)
第五章 从思之道德到正确生活	(127)
附录一 最低限度的道德：从被损害生活而来的反思 (节选)	(141)
附录二 自由时间	(150)
附录三 虚假文化与本真艺术	(162)
附录四 德性何为	(178)
参考文献	(193)
后 记	(206)

导论 奥斯维辛之后的追问

他大叫把死亡奏得甜蜜些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大叫提琴再低沉些你们都化作烟雾升天
在云中有座坟墓躺下不拥挤

清晨的黑牛奶呀我们夜里喝你
中午喝你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晚上喝早上喝喝了又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保罗·策兰：《死亡赋格曲》^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阿多诺在一篇题为“文化批评与社会”（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的文章中（1949），提出了一个广为流传但也饱受争议的命题：“文化批评发现自己面对着文化与野蛮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②

① [德] 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选》，孟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65页。

② T. W. Adorno,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I*, herausgegeben von Rolf Tiedemann unter Mitwirkung von Gretel Adorno, Susan Buck-Morss und Klaus Schultz,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3, S. 30; T. W. Adorno, *Prisms*, translated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2, p. 34. 根据韦勒（S. Weller）的考察，在这篇文章发表后，阿多诺在不同场合反复重申了这一命题，而其立场也有微妙的变化。参见 S. Weller, *Literature, Philosophy, Nihi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72—73。又，本书所有外文文献的中译文，如果没有标明译者，均是由本书作者翻译。

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以及推而广之的艺术创作）是否野蛮乃至是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属于人的精神生活层面，那么，阿多诺在出版于1966年的哲学代表作《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 Negative Dialectics*）中将上述命题加以修正后更进一步追问：

奥斯维辛之后无法写诗，这种说法或许是错误的。然而，提出以下这个文化色彩不是那么浓厚的问题却并不为错：对于那些侥幸逃脱而按理则会被屠戮的人来说，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能够被允许继续生活？^①

诗人策兰（P. Celan，1920—1970）与哲人阿多诺都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与幸存者。在前者的笔下，“大叫把死亡奏得甜蜜”的是人，“化作烟雾升天”的也是人，为何人可以如此对待自己的同类？后者的问题更为尖锐：奥斯维辛之后，人类的生存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我们知道，有着犹太血统的阿多诺“侥幸逃脱”了以奥斯维辛、达豪等等为名的集中营，但奥斯维辛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临在他的头顶。面对战争的灰烬与文明的废墟，阿多诺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深刻反思使奥斯维辛得以可能的思想逻辑，才能确保其永不重现，也才能真正告慰被其吞噬的无数生命。然而，我们不能将阿多诺的沉思仅仅归结为朴素的同胞之情，尽管他确实由于自己侥幸逃脱而怀有一份对牺牲者的深深愧疚。正如德国史学家迈内克（F. Meinecke，1862—1954）所言：“探讨在德国爆发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的更深刻原因这一问题，将是未来世纪所依然要从事的，只要这些世纪一般说来仍然愿意而且有能力思考这些问题。然

^① T.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2, S. 355.